

XIANAN GANBU GUDAGONG

XIANAN GANBU GUDAGONG

咸安干部去打工

曾祥惠 李金球 杨发维 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这一页多么精彩

●宋汉炎

如果用自己的双眼去读当今改革发展这部活书，我们每天都会有欣喜的发现。

2001年2月15日，在湖北咸安这个地处长江之南、京广线之侧的地方，原本平静的生活翻开这样一页：187名好端端端着铁饭碗的国家干部，告别亲友、告别故土，到沿海地带去打工。

这是惊世骇俗的一页。

这是令人费解的一页。

好好的国家干部，一夜之间成了打工仔，这是怎么回事？

原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背井离乡去重新谋职，这犯得着吗？

“他们的干部资格是不是失去了？出去打工，那工龄怎么算，档案怎么记？打工回来，还会不会有岗位，怎么安排？”当然有人表示怀疑。

“现在许多地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加之财政入不敷出，度日艰难。长此以往，于国不利，于民不利，于干部自己也不利。派出



宋汉炎：把这一页的悲壮

与深沉揭示给人看

一部分干部打工，为机构消肿，让干部锻炼，这是一件好事！”更多的是赞成者。

一事当前，见仁见智，自属正常。好在时间总会揭示事物的真相和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们只有服从。

像“灶妈子”三餐围着锅台转一样，办报人要天天围着报纸转，这是办报人的辛苦处；但新闻工作者作为时代的“祭酒”，他能时时触摸时代敏感的神经，听到时代咚咚地心跳，这又是他最幸运的地方。

作为稿件的终审者，我清楚记得 2001 年 2 月 15 日那天下午 5 点多，传到我稿库中的记述此事的稿件给我的第一冲击。记得循着发稿顺序先后找到 B1 版责任编辑何光华、记者部签稿主任陈启海、采写此稿的记者李金球时的那份欣喜、激动与某些疑问。身为最先披露这一页的湖北日报的一员，我与我的同事们始终觉得有责任把这一页的悲壮与深沉演绎、揭示给人们；在打工者集中的沿海地区，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南方诸多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页对当地的冲击；东海之滨申城的报纸也以特有的敏锐评介着这一页启世的意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则把导演这一页的咸安的主官——区委书记宋亚平请进京城，让他在万众瞩目的时刻对这一页实话实说。

无论从一地的实际需要看，还是从全局的发展看，咸安书写的这一页都有太多太重要的意义。干部制度改革需要探索，领导市场经济的人才需要培养，执政党的地位更需要牢牢巩固。历史和现实无数次证实：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只能僵化、呆板、老套，永远山重水复，没有出路；时代在前进，人心思改，人心思富，而改则活、则生、则富！

咸安的这一页，多么精彩又多么质朴，多么浪漫又多么现实，多么深奥又多么简单。它令人浮想联翩。我们报社 3 位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同志——曾祥惠、李金球、杨发维，从来都以充满激情的胸怀拥抱生活，发生在咸安的这一页当然没有逃脱他们的眼睛。

他们南下追踪这些打工者的足迹，倾听各方对这一页的评说，记录这一页里的主人公——咸安外出打工干部的真切感受，饱蘸心血，追赶时间的脚步，编著了《咸安干部去打工》这本书。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深感生活潮头一朵激越奔涌的浪花在这里得到快速的复活与再现。因此，我乐意向读者推荐这份来自生活的鲜活。

(作者系湖北日报社总编辑、高级记者)



改革发展的时代，波澜壮阔，精彩纷呈。我在真诚地面对咸安干部外出打工，也在用心感受、用笔书写。——湖北日报社高级编辑曾祥惠



多少次记录现实，我也有过让人有印记的文字。对咸安干部外出工的跟踪记录，让我激动，让我珍惜。——湖北日报社主任记者李金球



用镜头临摹生活，是我的职业。用镜头临摹咸安干部外出打工的支动人情形，是我的无比幸运、无尚荣光。——湖北日报社主任记者杨发维

策划编辑 董苏煌 傅祥
责任编辑 陈红 覃俭
封面设计 林蕊

ISBN 7-219-04345-7



9 787219 043455 >

目 录

1 / 这一页多么精彩 宋汉炎

台前幕后几多戏

- | | |
|------------------------|-----------|
| 3 / 放出小鸟 飞回雄鹰..... | 李明波 |
| 6 / 箭在弦上焉能不发..... | 宋亚平 |
| 16 / 省委党校的热点访谈..... | 王 玲 |
| 23 / 我从沿海到咸安打工..... | 俞声恒 |
| 30 / 摆正公仆的位置..... | 《湖北日报》评论员 |
| 33 / 各界人士品评咸安干部打工..... | 徐仲韬等 |
| 45 / 新闻界里的新闻..... | 毛晓光等 |
| 49 / 群众评说“咸安现象” | 王章一等 |
| 54 / 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 | 宋亚平 |

个中甘苦我心知

- | | |
|-----------------------|-----|
| 63 / 从党委书记到打工仔..... | 镇 权 |
| 70 / 我在深圳改变了模样..... | 陈亚平 |
| 77 /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 | 徐中青 |
| 83 / 不言输赢..... | 刘明灯 |
| 89 / 解读改革中的深圳..... | 郑洪胜 |
| 96 / 我的故事不多..... | 朱建堂 |
| 101 / 痛苦真是一个好课堂..... | 陈伟民 |
| 106 /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 徐志甫 |

| | |
|------------------|-----|
| 112 / 生活原来如此艰辛 | 柯贤纲 |
| 117 / 从天上回到人间 | 王 辉 |
| 123 / 好多事情从头学起 | 伍朝红 |
| 128 / 我当上了新闻记者 | 李 敏 |
| 133 / 精彩地投入 | 张艳玲 |
| 138 / 女人也能闯天下 | 寇 红 |
| 143 / 深圳之旅 | 何 靖 |
| 150 / 艰辛求职路 | 吴奇伟 |
| 156 / 一场没有下课铃的考试 | 王成安 |
| 166 / 初涉生意场 | 沈柱国 |
| 167 / 船到江心补漏迟 | 杨海军 |
| 173 / 儿子打工去了 | 朱亚希 |
| 176 / 我们才刚刚出发 | 李子牛 |
| 182 / 两个秘书变了身份 | 张拥军 |
| 188 / 坐了两个星期冷板凳 | 黄 洋 |

台前幕后几多戏

放出小鸟 飞回雄鹰

● 李明波(咸宁市委书记)

咸安区委选派 187 名年轻干部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锻炼,触到了人们最敏感的一根神经,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怎样认识干部二字? 如何才能当好一名合格的干部? 如果不当干部了,我们能够做什么?

咸安所在的咸宁市,毗邻大都市武汉,交通便利,是著名的“桂花之乡”、“楠竹之乡”、“苎麻之乡”、“茶叶之乡”,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咸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实现了从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跨越。但

同时我们也看到,咸宁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我们拥有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还很不相称,与沿海地区和省内相对发达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造成咸宁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干部的素质和观念从根本上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经济的发展靠环境,环境的创造靠干部,干部的关键在素质。



李明波:愿咸安外出打工干部展翅高飞

只有培养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干部群体,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才有希望。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干部群体,更是咸宁这样发展滞后地区的当务之急,也正是我们让一批干部外出打工锻炼的初衷。

如何看待咸宁的干部队伍现状?我认为绝大多数是好的,但确也有一部分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把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摆在群众利益之上,宗旨思想和服务意识日益淡薄;也有一部分干部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实则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还有一些人,尤其是青年干部,是由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许多人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生活的道路上更多的是鲜花和掌声。因此,他们不那么了解工人,不那么了解农民,对群众疾苦和生存艰辛不是那么感同身受,对老百姓存在着一些感情上的隔阂。这些干部不能说是不合格的干部,但是,不能很好地、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谋利益,不能真心实意地为基层为部门排忧解难。

怎样解决好这些问题?咸安选派干部到实践中重新历练一番,去当当工人,当当经营者,当当打工仔,换位思考,无疑是条有效途径,必定会淡化“官本位”的思想,强化宗旨观念,对于这些干部今后如何当官、如何当一个好官、如何当一个老百姓信赖的官不无好处。相信这段经历会对他们的世界观带来升华,使他们能力得以提高,人生更加充实。这种做法“道是无情却有情”。

提高干部的素质乃当务之急,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然而,目前不少干部不清楚市场经济到底最需要提高哪些素质。另外,还有一批干部对自身的业务素质也没有正确的评价,有的干部甚至自以为水平很高,不看书,不学业务,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贻误百姓。实践是试金石,可以试出我们每个干部有几斤几两,是真是假;实践是所学校,可以教给我们在干部岗位上所体会不到、学不到的一切。作为干部,在经济运行中是指挥者,或者说是主导者,而作为打工者,在经济运行中则是被指挥者,从干部到打工者,是一次角色的转换、思维的换位。

通过角色转换、思维换位，干部可以学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经济运作的具体方法，加深对这些地区体制创新和观念更新的理解，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同时，也会发现自身素质方面存在的缺陷，有利于找准今后努力的方向。

值得欣慰的是，咸宁很多干部目前已意识到，行政机关的“铁饭碗”迟早是要被打破的，这是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惟一不破的饭碗就是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增强竞争力，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在困境中面对挑战、在挑战中不断完善、在完善中不断提高，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现在咸宁市不少干部要求单位举办电脑讲座、英语讲座，有的干脆自己利用休息时间交钱上补习班。一股学习的热潮在慢慢兴起。

当然，选派干部外出打工锻炼，并不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惟一和必需途径，在有些地方也许并不一定适合，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对这一新生事物，我们要满腔热情予以支持。

全国近 100 家新闻媒体对咸安干部外出打工进行了集中报道，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实话实说》还专门对此进行了采访。《湖北日报》更是情有独钟，派出记者到沿海地区跟踪报道咸安外出打工干部，写出了一批具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的新闻和理性分析文章，新颖独到，分析透彻，对我们鼓舞、启发很大。尤其是《湖北日报》组织的一次专家讨论会，对咸安干部外出打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一做法的认识。我们真挚地感谢新闻界对咸安改革发展探索的支持。

但愿我们首批选派的 187 名外出打工锻炼的干部，不辜负各级领导和新闻界朋友的希望：“放出小鸟，飞回雄鹰。”

箭在弦上焉能不发

●宋亚平(咸安区委书记)

“为什么作出干部去沿海打工这样的决策？这与全区改革发展的需要分不开，与咸宁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分不开，也与我在沿海打工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2001年3月5日，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率地说。

我向记者们详谈了这次决策的台前幕后、实施中的风风雨雨。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我这个农家子弟考进了武汉大学。我是一个刻苦学习的人，在校四年，学业成绩突出，可谓品学兼优。后来，我又以优异成绩考上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当时进入湖北省政府办事机构的惟一研究生。

我工作的单位在当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单位。然而，在这个首脑机关工作的一些日子，我的内心却总是不能平静。南方改革风起云涌，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在内地广为传颂，整天在平静中上下班的我生出无限遐想：与其在机关过安稳平庸的日子，不如



宋亚平(左)：纵然有千难万险也不会动摇

到南方去闯荡一番，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于是，1988年初，我毅然向省政府研究室递交了辞职报告。我的报告，在省政府机关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不可理解：“这人是不是有毛病，放着人家打破脑袋都钻不进来的工作不要，到南方去混？”“南方有什么？搞的不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么，有什么前途？”“有他哭的一天的。弄不好，他想回来也回不来了。”

妻子也不理解：“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到南方去有什么好果子吃？”

当时的省长郭振乾是个宽厚的长者，好心地找我谈话：“在省政府工作，会有一个好的前途。”

我是个有主见的汉子，拿定了主意的事，“八头牯牛也拉不回头”。在人们的怀疑、揶揄和讽刺中，我在一个黎明毅然去了南方。行前，我穿着一双塑料凉鞋，妻子在我的旅行包里装进一套换洗衣服，并塞给我家里仅有得 280 元钱。

当火车“吭哧、吭哧”地抵达深圳，我用陌生和兴奋的眼光打量这座改革中的城市，感到一切都很新鲜。然而，深圳用它特有的市场经济的方式迎接我。我去找好几个先到深圳闯荡的武汉大学同学，这些被改革激荡着的年轻人，早就跳了好几次槽，原来的地址哪里觅得见人？我只好拿着大学、研究生文凭去推销自己。人家见我文弱书生一个，大多客气地寒暄几句，让我留下有关资料，便没有了下文。

眼见身上的区区几百元日渐少去，我急得在深圳街头走来走去。当我信步来到深圳长途汽车站时，眼前不禁一亮：“人家能够为顾客扛行李挣钱，我为什么不能？”我没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卷起袖子加入扛包的行列。人家扛一次包，收个 10 元、8 元，我扛一次包，收个 3 元、5 元，这一来，找我扛包的人多了起来。一天下来，我躺在 10 元店里，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数一数第一天的收入，毛毛散散的票面加起来只有 27 元。少虽少，毕竟是自己打工挣来的，我于苦涩中有几分欣慰。

扛包到第七天，我被路过汽车站的一个武汉大学同学发现：“怎么品学兼优的宋亚平在这里干这营生？”经这个同学极力推荐，我在一家推销专利技术的公司找到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我的诚恳、细心，使我很快赢得了许多订单。自然，我的收入也可观起来。

到深圳的一段时间，我过得非常紧张。有时，我静下心来一想，这样下去行吗？在当时的深圳，像我这样学历的打工仔还不多见。我自然生发出许多不甘平庸的设想。

我是个想到了就要做的人。我自立门户，到华南许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贩卖技术，然后推销到社会急需的单位。那些长期锁在柜子里或停留在会议中的新技术、新项目，使我的用户受益匪浅。我在这个高雅圈子里的声望日增。后来，我依靠自己辛勤劳动的积累，办起了自己的工厂、公司，成为南方颇有影响的打工者。

这时，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以知识经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演进带来了全球政治、社会的激荡。知识，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力量，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始终关注着世界政治、经济动向的我，心灵又一次受到巨大的震撼。现在，我本已获取了常人不能获取的金钱、地位，却又一次陷入了深思：仅有钱就够了么？一介书生，穷得只剩下钱，当然是最可悲的。我不能做这种可悲的角色，我要做搏击时代风雨、领略时代精神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1990年，在下海打工两年之后，我报考了我国著名史学家、华中师大校长章开沅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从风起云涌的南方回归武汉，在风平浪静中读书两年，得以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冷静且理智地进行广泛涉猎。

这两年求学，我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总是习惯用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苛刻地看待变革的社会，总在试图从纷繁复杂的世事中找寻反映社会改革发展方向的东西。我找到了许多，也有了许多留待今后进一步找寻的问题。在校期间，我独立思考撰写、发表的论文，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毕业那年，应朋友之邀，我到海南度假。一个非常偶然的机

会,与中国当时仅有的几个开发区之一的海南洋浦开发区负责人江上舟相遇。这个留欧的学子,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是一个立志献身中国改革事业的志士,其妻是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两院院士。我们相遇,在宾馆的房间里有了竟夜之谈。我们谈国事、家事、天下事,话题广泛而热烈。一夜长谈,我们有了太多的共同语言,有了一个两人都不能终止的话题:如何为改革的时代奉献一份自己的光和热?

当时,江上舟要我假期在洋浦停留,帮助工作。我是个热血汉子,满口应承。我在这个临时帮办的位置上,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开发区起始时的设计、参谋、咨询、督办的角色。正所谓“闭门工作忘岁月”,江上舟在暗自庆幸得人的时候,来了个“陈仓暗渡”,抢在早已有意录用我的北京某要害部门的先头,派人将我的档案从武汉拎回了海南。生米煮成熟饭,我于几分惋惜中留在了海南。好在我为之服务的地域和方位,是那么充满挑战;我与之共事的上司和同事,是那么投缘。我很快把全部心思都交付给了新的生活。

此后六年间,是我平生最紧张的一个时段。海南处在作为沿海开放的最大特区的位置上,洋浦处在海南开放的前沿,那么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一并呈现在我和我的上司、同事面前。我充当了局长办公室主任、社会发展局局长、拆迁征地办公室主任、工委办公室主任、政办党办合并后的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因为我的努力工作和不凡表现,我多次得到海南省委、省政府的表彰,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

最令我不能忘记的是在海南工作期间,我因为工作需要,先后20多次到国外考察、访问。西方所有发达国家,我都到了。当人家在工作之余,欣赏海外风光或放松休息的时候,我却在忙着进行相关社会、经济调查,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思考着改革发展中一些能够深入推进的问题。当然,这对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眼光和能力,是一个新的培育。我被南方一些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有许多研究生师从于我。